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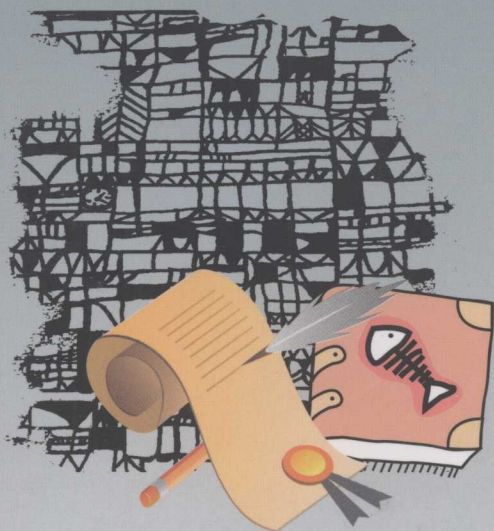
守望文学丛书

王爱英主编

孙玉蓉 王之望 主撰

TJWXL

天津文学新论



大众文艺出版社

孙玉蓉 王之望 主撰

TJWXXL

天津文学新论

大众文艺出版社

天津文学新论

孙玉蓉 王之望 主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津文学新论/王之望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 10

(守望文学丛书/王爱英主编)

ISBN 978-7-80240-075-7

I. 天… II. 王…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天津市
IV. 1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54862号

天津文学新论 孙玉蓉 王之望 主撰

策划编辑 刘铭

责任编辑 刘然

装帧设计 华之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市建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毫米 1/32

印 张 87.75印张

字 数 2600千字

印 数 1-2000册

版 次 200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总 定 价 268.00元



大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大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晨曲·雅韵·钟声

——天津文学前史概述（代前言）····· 1

第一编 名家新论

一 “买珠买椟费评量”

——严修的域外诗····· 13

二 中国现代话剧的先行者：张伯苓、张彭春兄弟····· 19

三 袖里红霓现，笔风驾云涛

——何心冷的文字生涯····· 27

四 国学大师季羨林与天津的文学缘分····· 33

五 孙犁、冯骥才微型小说创作片论····· 42

六 略论《红旗谱》的经济描写····· 50

七 梁斌与新世纪剧社····· 68

八 鲁藜的人生道路与“胡风集团”····· 115

九 灵魂深处的意义纹案

——论穆旦诗歌的主题原型····· 132

十 穆旦的诗歌····· 147

十一 鲍昌论诗的美学意义····· 152

第二编 新作论评

- 一 保卫私人空间
——康弘的长篇小说《私人空间》····· 157
- 二 走向新农村的阵痛与欢乐
——王焕庆长篇小说合论····· 162
- 三 乡村教师的背后
——秦岭论····· 168
- 四 爱与死之间的生命醉舞
——水荻的小说····· 179
- 五 不仅仅是轻灵
——水荻的散文····· 189
- 六 璞玉般心灵的流露
——庞科慧的《月色温柔》····· 197
- 七 偏好流淌在梦境中的歌吟
——可雯的《阳光小溪》····· 207
- 八 人生之旅的温馨提示
——杨光祥的《人在旅途》····· 214
- 九 向灵魂深处发掘历史
——张法魁的《安史之乱评话》与《砺志之歌》····· 224

第三编 热点专论

- 一 肖克凡长篇小说《机器》研讨会综述····· 231
- 二 改革开放的一曲赞歌
——柴德森的长篇小说《大爱至情》····· 240
- 编后记····· 247

晨曲·雅韵·钟鼓

——天津文学前史概述

(代前言)

在中国广袤无垠的文学版图中,历经数千年的传承积淀,耸立起一座座城市文学峰峦。无疑,天津也是其中巍峨壮丽的一座。

如果说天津文学的本体在市区的话,那么,直到晚近才划属天津的蓟县等县区,则有着远为古往的辉煌。据考证,公元6000年左右,蓟县围坊一带业已形成村落。春秋时,属无终子国并建都于此。秦代置无终县,属右北平郡并为县治。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属渔阳郡。隋大业三年(公元607),为渔阳郡治。大业末年,更县名为渔阳。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为蓟州州治。由于开发较早,战略地位显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秦皇东巡,曹操北征,唐太宗东征,都曾经过这里;长时期成为州县所在地,春秋和隋末等有几个小王朝,还建都于此;加之寺庙众多、盘山胜景,自汉唐以来,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竟相来此游赏题咏,留下大量诗文。本土文化也得以滋生繁荣。

以蓟地题材入诗,最早是大诗人陶渊明。他在《拟古》其二,托言寻访汉末无终义士田畴,表示对田畴为人正直、恪守信义、气节高迈的“士雄”精神由衷赞佩,以及对于苟且求荣、不顾节操的“狂驰子”们的鄙弃。宝应元年(公元762),诗圣杜甫在梓州听说唐军大举北伐,

写了《渔阳》一诗：“渔阳突骑犹精锐，赫赫雍王都节至。猛将飘然恐后时，本朝不入非高计。禄山北筑雄武城，旧防败走归其营。系书请问燕耆旧，今日何须十万兵。”表达了对于收复北方失地的信心，敦促安史旧部早日归降。杜甫、陶渊明虽未亲历过蓟地，却写下这样不朽的诗篇，足见天津本土文学资源早已具备丰厚的审美潜质和魅力。

唐政权与北方契丹游牧部落集团的矛盾甚为突出，侵扰与反侵扰或边将为邀功而主动出击的战事不断，边城要塞也因此成为吸引一部分待机立功、求取功名的文人前来巡游歌吟之地，写出不少带有渔阳边塞生活特色的“边塞诗”，张仲素《塞下曲》写道：“三戍渔阳再渡辽，骅骝在臂剑横腰。匈奴似欲知名姓，休傍阴山更射鵰。”大气磅礴，充满威震敌胆、驱除边患的自信。张籍的《渔阳将》，描写一位都护率领官兵紧张而又周到地安营扎寨情景，诗情警觉而较为乐观。张为的七言绝句《渔阳将军》，则以静穆浑厚的情致描写一位“渔阳将军”：“霜髭拥颌对穷秋，著白貂裘独上楼。向北望星提剑立，一生常为国家忧。”诗人用苍凉雄健的笔触，声形毕肖地刻画了一位忠于职守、高度警惕、终身忧国的老将军形象，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崇高情怀。还有一些作品，表现了连年边战给征战士卒、家庭及当地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这方面，尤可以刘长卿的作品为代表。他的《疲兵篇》写久戍不归战士的痛苦：“万里飘摇空此身，十年征战老胡尘。赤心报国无片赏，白首还家有几入。”写战争给长年在外征战者家庭造成的苦难：“军前仍欲破重围，闺里犹应怨未归。小妇十年啼夜织，行人九月忆寒衣。”对战争造成的无情杀戮和人员伤亡，他深表同情和愤慨：“只恨汉家多苦战，徒遗金镞满长城。”刘长卿还对士卒的牺牲与痛苦在军中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和人性关怀的现实，表示不满：“元戎日夕且歌舞，不念关山久辛苦。”这与高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燕歌行》）的控诉，有异曲同工之妙。刘长卿的《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进一步暴露了战争给当地百姓带来的创伤：“城池

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由对战争破坏性的控诉，自然引发出对于战争责任者的追问。

辽金元时代，一些蓟渔文人有较多的机会进入社会上层并从事创作活动。他们当中比较著名的，有左企弓、张斛、刘中、韩玉、鲜于枢等。张斛，金初为秘书省著作郎。其作品甚为元好问、宇文虚中激赏。诗载《中州集》卷一，《全金诗》据颂芬室影元本，录诗19首，多融情于物，含蓄蕴藉，有“前辈风调”（元好问），如“归去南溪上，轻舟细浪浮”（《仙门驿听泉》），“云开千里月，风动一天星”（《巫山对月》），“细草沙边树，疏烟岭外村”（《河池出郭》）等，都是为时人传诵的佳句。左企弓（1051-1123），字君材。辽天庆末，官广陵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保大二年封燕国公。入金以后，官太傅、中书令。元脱脱《金史》卷七五有传。他的作品多散佚，《全金诗》录其诗《献金太祖诗》，有云“君王莫听献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其肝胆志趣可见一斑。刘中，字正夫。明昌五年进士，以省掾从军南下，为主帅所重，“书檄露布，皆出其手。”军还，授右司都事。博学多能，造诣精深，元好问称其“工诗善赋，尤长于古文。诗清便，赋甚得楚辞句法，文典雅雄放，有韩柳气象。”文集已佚，《全金诗》仅收录《冷岩公柳溪》、《龙门石佛》2首，澄淡精致，甚有法度。刘中在当时文坛颇有影响，王若虚、高法扬、张履、张云卿等皆出其门下。与刘中同时代诗人韩玉，才华横溢，“尝应制一日百篇，文不加点。”所作《元勋传》，得章宗赞。官至河平军节度副使，后以谋反罪被诬遇害。《全金诗》收入其《临终》诗2首，说：“天下无双士，军中有一韩。才名两相累，世道一何难。”“衰年会凶运，奇祸发流言。”表示自己因才名太大被人妒忌而遭诬陷，对此他深感冤愤：“仰呼天外恨，沉思地中冤。”“此心终不灭，有路诉天阍。”当抗争无路，灾难已不可避免时，他反到坦然自若：“丈夫忠义耳，无惜感歌还。”悲歌慷慨，回肠荡气，大有燕赵壮士之风。

古代蓟渔文学贡献，还应提及元代的鲜于枢父子。枢字伯机，能

曲能文，工书法，精鉴赏，官至太常典簿。诗文多抒发其人生感慨，如《题赵拓本兰亭后》：“南来北人多健者，各色连艘金满屋。应嗟我辈太痴绝，常抱蠹书论得失。”他因看不惯官场腐败，常想辞官归隐：“悔不绝粒巢云松，失身误落尘网中。”（《望峰山》）鲜于枢的儿子去矜，是元代的著名曲作家。他与杨梓、贯云石共同创制、定型的“海盐腔”，后来成为明代戏曲四大声腔之一。去矜的曲作多吟唱山川美景和历史人物，风格豪放飘逸，富于变化，自成一家。他写居庸关的雄伟：“耸巖崖万仞秋容，气共云分，势与天雄。”写卢沟晓月：“桥俯危波，车通远塞，栏倚长空。”写蓟门的风云变幻：“阿香车推下晴云，早海卷江悬，电掣雷奔。”都写得气象万千，壮丽多姿。他善于将主观情志融于景物描绘之中，如写暮雪独钓：“晚天昏，寒江暗，雪花黪黪，云叶氍氍。渔翁倦欲归，久客愁多撼，浩浩汀洲船着缆，玉蓑衣不换青衫。闲情饱，高眠醉酣，世事休参。”他刻画人物也运笔自如，写诸葛武侯道：“草庐当日楼桑，任虎战中原，龙卧南阳。八卦图成，三分国峙，万古鹰扬。出师表谋谟庙堂，梁甫吟感叹岩廊。成败难量，五丈秋风，落日苍茫。”他的曲作在当时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朱权评价说“鲜于去矜之词如奎壁腾辉”。

古渔阳文学除了官场和社会主题之外，还以盘山景物为主要对象留存大量诗文。盘山自古称“京东胜境”，历代帝王才子，竞相登临览胜，吟诗作赋。仅以明代而言，就有方孝儒、唐顺之、袁宏道、李攀龙、王世贞、谢榛、汤显祖、刘侗等著名作家。名将戚继光的《登盘山绝顶》，尤其脍炙人口：“霜角一声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边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使雕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寄慨深远，壮怀激烈，非同凡响。戚诗感染力强，影响较大，后人写了不少和诗，郑纘祖《盘山绝顶次戚少保韵》，写道：“英雄事业身难遇，少保曾登舞剑台。”可谓深得戚继光诗意。本土作家、进士李孔昭，于明亡后隐居盘山不仕，有诗集《秋

壑吟》传世，入诗 140 首。著名诗僧智朴，著有《谷响集》、《电光录》、《云鹤集》、《盘山集》、《存诚录》、《台游集》、《辛壬蔓草》等诗文作品，还广泛搜集资料，撰成《盘山志》5 卷，并经由王士禛、朱彝尊校订，历代歌咏盘山风物的名篇佳什，悉数搜罗，为研究盘山和古蓟渔文化保存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古蓟渔文学虽然未能涌现多少方家巨擘、鸿文大制，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未能造成洪钟巨响，但它始终与高品位文化保持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贯穿了可贵的写实文统，体现了慷慨悲壮、关注国计民生的风格倾向。古蓟渔文学的繁荣发展，为天津文苑书写了有声有色的前史，成为回映天津 600 年主干文学的一缕绚丽朝霞、一曲悠扬的晨曲。

自明永乐二年（1404）筑城设卫以后，随着军事和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天津的城市规模和文化事业也得到较快发展。以繁盛期的水西庄为中心，更将古典时期的天津文学推上历史发展的颠峰。

清代康乾年间，天津富商建造私家园林成风，如张霖的问津园、金平的岭南园、龙震的老夫村、张笨山的帆斋、安歧的沽水草堂、佟毓的佟家楼等，而以水西庄名最著。水西庄始建于雍正元年（1723），位于旧城以西南运河右岸，占地百余亩，历经数十年的扩建、增修，成为一座在当时可与扬州玲珑山馆、杭州小山堂相媲美的一代名园。以致乾隆南巡路过天津时，曾先后四次在此“驻蹕”。水西庄不是一般专供游玩休憩的场所，而是一座“蕴涵着巨大的历史文化的丘壑”。它兴办书院从事文化教育，收藏金石文物及名家字画，雕印出版大量精美书籍，组建剧团演出歌舞戏曲等等，并且热衷招徕聚集四方名流才俊，切磋艺术、促进文学创作。

水西庄的文人集团具备很全面的文化修养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水西庄的文人创作，不论查氏主人还是如朱岷、汪沆、吴廷华等门客，都不拘囿于文学艺术自身。查氏家族世代书香，水西庄主查日乾、查为仁父子博学多才，经、史、子、集无所不通，诗、文、书、画无所不能。

在他们的熏陶影响下,其子侄女眷辈也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经常举办家庭诗会或金石、书画、戏剧鉴赏之类的文化活动,并且留下为数不少的诗文著作。查日乾于诗文之外,“史事尤精”,著有《左传臆说》4卷、《史腴》4卷等;查斌对经史也有较深的研究,著有《易经集说》、《经史汇参》等。查氏庄主还大都精于书画文物鉴赏与收藏,并时常挥毫泼墨,妙善丹青,或金石书法。汪沆客居水西庄期间,不仅写有著名的《津门杂事诗》等作品,还与吴廷华一起受聘主修《天津府志》40卷和《天津县志》24卷。姜宸英曾参与《明史》的编写。后来定居于水西庄的朱岷更是绘画高手,他创作的《秋庄夜雨读书图》、《水西庄修禊图》及与人合作完成的《慕园老人携孙采菊图》等,至今仍被作为杰出艺术品珍藏。全面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修养,不仅使水西文人养成文化艺术创造的多面手,更重要的是为他们的文学创作能够达到较高的审美境界和水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水西庄文人创作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官商文化与文人文化的结合。水西庄主集官、商、文三者于一身,为水西庄文化注入了独特而浓重的底色。实际上,长年寄居水西庄或南来北往的过客中,大都不是纯粹的布衣文士。其中,有不少是属于“权力阶层知识分子”的角色,如陈元龙为文渊阁大学士,钱陈群为刑部侍郎,赵执信和姜宸英皆官编修,吴廷华官翰林,陈奕禧为南安太守,又如长芦盐运使张璨、永定河道英廉、天津知州宋鼎、遵化知州杜甲,有的官位不高却以水西庄为暂栖之地,边做学问,边徐求进身之阶。还应提及的是,作为封建阶级的最高统治者和权力知识分子的最高代表,乾隆皇帝在南巡途中曾四次驻蹕水西庄,于处理政务和休憩之余留下了御笔题咏。有人说查氏投巨资兴建庄园、延揽名士,与当时一般富商以此附庸风雅的风气有关,这种说法恐不一定全面。水西庄建书院、修方志,编辑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典籍和诗文著作,确实为发展天津文化扎扎实实地做了不少好事,这是不容抹杀的。当然,查氏与权力知识分子交往,

尤其接连不断地迎谒“御驾”，也不能排除有抬高身价、光宗耀祖，为巩固、拓宽查氏门第财源和官运的良苦用心。发展文化既是查氏的高尚追求和情趣之所在，又是进行社交和经商的媒介，三个方面相辅相成，融为一体，这确是一种十分罕见的文化现象。

水西庄文人创作再一个重要特点，是家族文化与社会精英文化的紧密结合。水西庄主人祖籍江南而生长于北方，作为历史久远的名门望族，查氏宗亲遍布南北各地，这是水西庄文化南北交流融合的家族渊源；水西庄主既是巨商，又是大儒，还是世代为宦的官吏，这三重身份使他们具有雄厚的财力、超人的文化修养和开阔的文化视野，视野开阔才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修养超迈才能对八方文人有吸引力、亲和力，财力雄厚才能给终日巨量的靡费以支撑；天津地处九河下稍、京城门户，历来是南人北来经商朝谒和北人南赴闽越的必经之地，此乃水西庄文化集南北之长的区位优势。正因为如此，水西庄在当时名重一时，不仅聚集了津门本土的大量文人雅士，而且北自京都南至苏杭的文化名流也慕名而来，如浙江诗人学者陈云龙、厉鹗、杭世骏、汪沅、吴廷华、蒋诗、姜宸英、陈皋、胡睿烈，江苏著名文人朱岷，山东学者赵执信，四川学者张问陶等等，都曾是水西庄主人的座上客，宾主或吟咏作画，后谈诗论文，“名流宴吟，殆无虚日”，北南文艺创作的实践经验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由于不遗余力地接纳社会文化精英，通过这种广泛的交流、切磋与合作，才有可能不断克服家族文化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使水西庄成为当时天津文化最高成就的重要标志，成为引领天津文化潮流的一面旗帜。

现存水西庄文化中的精品，大抵都是家族文化与社会精英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之作。这又有三种情况，一是得到外界文化精英的奖掖鼓励，如查为仁与袁枚虽未谋面，却互知其名并有所联络，查为仁曾转送袁枚《蔗塘未定稿》，受到后者的赞赏，对查氏的《莲坡诗话》尤为推重，称其“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句，诗之灵在空不

在巧,诗之淡在妙不在浅”的主张,“其意颇与吾意相合”。这种奖掖鼓励对于提升水西文化的知名度及其在文坛地位,甚为重要。二是共同合作。传世名著《绝妙好词笺》,就是查为仁与厉鹗二人“篝灯茗碗,商榷笺注,搜罗考订”,通力合作的结晶。这部书“采摭诸书以为之笺,各详其里居出处,或因词而考证其本事,或因人而附载其逸闻,以及诸家评论之语,与其人之名篇秀句不见于此集者,咸附录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文学史料价值。又如著名的《沾上题襟集》等诗画作品,则是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合作的产物。三是社会文化精英对水西文人的影响,如汪沅用江南竹枝词的清新雅韵吟咏天津风物的《津门杂事诗》百首,脍炙人口。受它的启发和影响,诗人崔旭写下了诗集《津门百咏》。没有与当时为数众多的第一流文化名人密切交往与合作,水西文学要达到这样高的水准和成就,恐怕是不大可能的。

犹如一支琴韵幽雅的专业演出团队,水西庄文化实现了天津文学与全国主流文学真正意义上的接轨,对天津近代文人和文人创作产生深远影响,催生了诸如梅成栋、崔旭、金玉冈、王敬熙、华长卿、杨光仪等本土作家的相继涌现,促进了天津古典文学的发展。但是,水西庄的文学成就从总体上说,依然没有超越本土范围和那个时代泥古风习的阂阃。天津文学真正引起全国文坛乃至整个思想界的巨大震动和瞩目,当是在晚近以后。

天津自19世纪下半叶被辟为通商口岸和中国北方地区“洋务”中心之后,迅速膨胀成为近代化工商业大都会,吸纳不少国内文化精英,中西文化经历了空前剧烈的大碰撞、大交流,在对传统封建文化的沉痛反思和清算中,他们成为最先认识到中国文学旧路已到尽头的“早醒者”,也是大胆探索和披荆斩棘、另觅新径的勇敢实践者,反映了新旧嬗变时代中国文学变革的进步诉求,仿佛震聋发聩的晨钟暮鼓,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和文学启蒙发挥了振臂高呼的首

倡作用。

这一时期天津文坛对于中国文学的突出贡献,主要是:

一,引进“进化论”的理念,彻底动摇旧文学的理论根基。明清以来的中国文坛,长时期被一股因循守旧的复古思潮所笼罩,由于这种思潮与业已腐朽透顶的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和主流意识保持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任何要求抒写性灵、发展个性、创造新机的呼声,都被视为异类而大张挞伐,最终淹没于厚古薄今、死守祖宗家法的滔滔浊流之中。要改变这种状况,恢复文学的生机和活力,必须有一个观念的彻底变革。恰置此际,就职于北洋水师学堂的严复,在《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重要论文,运用西方的先进理念,抨击封建专制,主张变法维新,喊出了“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呼声。他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利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揭示了世道变则存、不进化必遭淘汰的思想,足令陷身民族危机之国人振聋发聩,从昏然沉睡中猛醒过来。严复的论文和译著虽并未直接论述文学问题,却从根本上颠覆了统治文坛的复古思想,打碎了束缚文学新变的枷锁。

二,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下开“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之先声。

刊登于《国闻报》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为严复、夏曾佑二人合写。这是天津文学界出现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理论批评文章。文章指出,小说具有“难言之理则隐寓”的审美特点,以及入人深、行世远的巨大感染力量,同时,它既可作为“人心所构之史”,又可作为“正史之根”,其地位“几乎出于经史之上”。文章重视小说在思想启蒙中的积极作用,说:“且稳欧美、东瀛,其开化时,往往得小说之助。”“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把小说的优长、地位和作用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彻底改变了传统文论视小说为不入流的错误看法。为随后不久梁启超、黄遵宪

等维新派作家提出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奠定了理论基石。事实上,严、夏之文对梁氏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深刻影响和启示,是毋庸置疑的。梁启超后来说过:“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曰《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殆万余言,余当时狂爱之。”所不同的是,《缘起》对于小说的理解比较客观和科学而不像梁氏那样偏激。还应提及,夏曾佑还写过《小说原理》等论文,而作为中国文学整体性变革的主要倡导者的梁启超,后来也移居天津。完全可以说,天津是近代文学变革浪潮的发祥之地。

三,在创作实践中积极探索,向着新文学迈出最初步履。从19世纪末起,天津文坛的这些“早醒者”们在从事理论倡导的同时,也开始了背离传统、追求变革的尝试。夏曾佑积极进行“新诗”的创作,这些作品虽然仍沿用旧诗的形式,而且好用僻典和掇拾新名词入诗,但在那些略嫌晦涩生僻的诗句中,却蕴藏着文化启蒙与思想解放的信息,敏锐地表现出先进知识分子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强烈追求。李叔同则在歌词写作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现在能见到的有47首。他的作品或委婉曲折,或直抒胸臆,表达了忧虑祖国危亡、追求民主自由、渴求人生美好等新的时代气息和理念。如《送别》等名作,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和传诵。在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中,李叔同使歌词成为诗歌艺术变革中走向最前列的品种,这是他对中国新文学作出的独特贡献。女诗人吕碧城,有《信芳集》、《晓珠词》、《欧美漫游录》等传世,作品时现追求女性解放的光彩,《绛都春》、《红梅引》、《玲珑玉》、《解连环》等,以海外风物入诗,显得新颖别致。龙榆生编《近三百年名家词》列她为300年来词家之“殿军”。钱仲联称其为“近代女词人第一”。这一时期在北洋大学求学的李大钊,发表了《大哀篇》、《隐忧篇》、《裁都督横议》、《论民权之旁落》等政论散文,已显示出朴实犀利的特色。后来,他在《甲寅》上陆续发表的《风俗》、《政治对抗力之养成》等文,更以“逻辑文学”的代表作家而著称。他的

《游几碛石山杂记》、《民彝与政治》、《青春》等文章，在融火热的激情于严密的逻辑思辩之中，具有强烈的理性说服力、正义号召力和审美感染力。

这个时期的天津的启蒙主义文学，从理论倡导到创作实践，都走在时代的前列。虽然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进化论的思想武器已远远不够用了，但它毕竟为这一更深刻的文化运动起到了廓清道路和思想动员的作用。创作上，它虽然没有彻底摆脱旧文学的外衣，有时甚至还显得不伦不类，但他们辛勤探索的触须实已突入新与旧的临界点。在个别作家如李大钊那里，除了在文体上还采用文言而非白话，实际已俨然新文化启蒙者的姿态。在它的冲击下，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很快就应声登场了。